

## 出版史研究

## 從蘇州寶翰樓出版品看清初出版文化

郭明芳\*

出版史研究中，有一種是地域性書坊出版。這類書坊出版研究最難的是各類書坊資料絕少，所刻書現存於今者，亦紛雜於各地館所。吾人若欲研究其興衰與其刻書情形，十分不易。縱使有研究專文，或以訛傳訛，或輾轉稗販，了無新意。故研究一時一地書坊非必上窮碧落下黃泉，翻檢各類資料，稍有所成。而對於建構書坊出版史或出版文化研究，如能個個擊破，相信幫助頗大。以清初蘇州寶翰樓為例，如將相關資料彙整，並輔以文獻材料，對瞭解該肆興衰、刻書，及其與四方交流情形，絕對是建構江蘇刻書史一角。

寶翰樓為清初蘇州書肆，其所能得到文獻資料，非常地少。而所刻之書又雜陳各地，除需收集外，尚須進一步判讀，方能成為寶翰樓刻書研究材料。據瞿勉良《中國古籍版刻辭典（修訂版）》介紹，其為「明末清初吳郡人尤雲鵬的書坊名。開設創始於萬曆間，至清同治間猶存」，所刻書亦夥。<sup>1</sup>餘未見有專文介紹。

近又有日人笠井直美整理寶翰樓刻書目錄並有詳盡研究，對寶翰樓主人與所刻書籍有相當考證。<sup>2</sup>笠井認為寶翰樓主人沈氏<sup>3</sup>，所刻書約有百數十種。其〈吳郡寶翰樓初探〉亦談及寶翰樓出版活動。而筆者亦見有一些議題可再討論者，例如說寶翰樓所刻《三魚堂四書大全》即是一例，笠井文稱：

有些書籍（例如：陸隴其所著的《三魚堂四書大全》、《四書講義困勉錄》，張鵬所著的《張氏醫通等》）從參與出版者籍貫、活動地點、出版過作者其他著作的書肆、以及版本各種特徵（版式、字體等等）可以

\* 東吳大學中研所博士班

<sup>1</sup> 詳見瞿勉良編《中國古籍版刻辭典（修訂本）》（蘇州：蘇州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2月），頁585。

<sup>2</sup> 見氏撰〈吳郡寶翰樓書目〉（《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》第164冊，頁256-316，2013年12月）與〈吳郡寶翰樓初探〉（《古今論衡》27，頁101-134，2015年4月）二文。又中研院史語所於2012年9月25日邀請笠井就此主題演講，此詳〈笠井直美教授講演吳門寶翰樓初探紀要〉（網址：[http://mingching.sinica.edu.tw/Academic\\_Detail/174](http://mingching.sinica.edu.tw/Academic_Detail/174)）

<sup>3</sup> 笠井之說筆者亦表贊同，其中徵引熊寶泰〈謁方靈皋先生祠堂記〉云尤氏寄居江寧，富於資，遂刻梓《南山集》，且相關序跋未談及尤氏有寶翰樓。若以筆者於本文提出寶翰樓接受私人刻書業務，則尤氏委諸寶翰樓刻梓《南山集》，就可以貫串。更何況張伯行奏疏中明言蘇州寶翰樓主人為沈氏，更是明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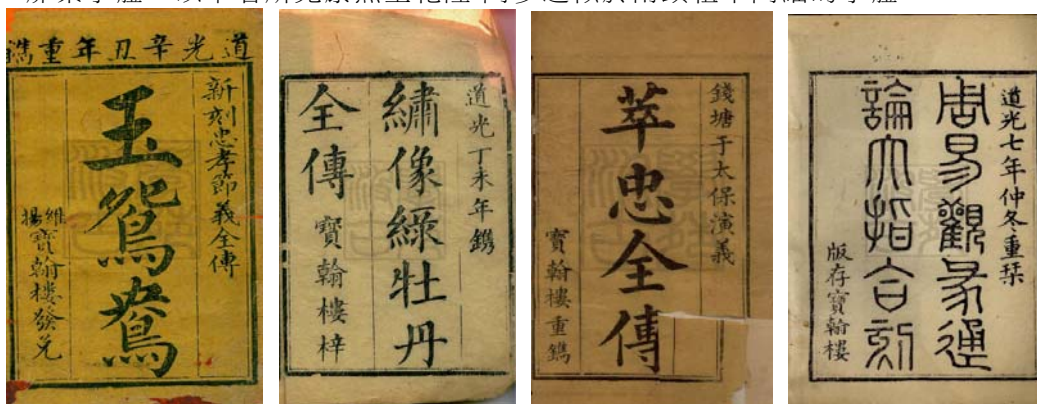
推測吳郡寶翰樓所參與出版的可能性較大。

這樣的說法，筆者十分贊同。對於該二文與時下研究而言，筆者亦有不少有不同想法加以補充，現就所見一一加以探討。這些議題包括了寶翰樓書肆經營、刻書及其與私人合作關係、有關翻印與版權保護措施、書版轉移與本衙藏版諸問題等。

### 一、關於寶翰樓時限與分肆

前述瞿氏所言寶翰樓營業至同治間，筆者認為不可能，此應同名書肆。首先，未考慮到太平天國對傳統書坊的破壞。當時只要太平天國統治區域，出版是統制的，一律經官方應允方能出版，傳統書籍多遭禁毀。再者，筆者從現存確有「寶翰樓」標記的圖書看，寶翰樓刻書至遲止於道光年間。

而於廣州或揚州亦有名「寶翰樓」者亦應非與蘇州者有關。廣東禪山/佛山亦有書肆齋名「翰寶」，非「寶翰樓」，明矣。而維陽寶翰樓刻書，多於道光間，其扉葉字形與蘇州者不類，亦可證之非蘇州寶翰樓。按，關於寶翰樓扉葉字體，以筆者所見康熙至乾隆間多近似於兩頭粗中間細的字體。



維陽寶翰樓扉葉書影<sup>5</sup>

其次，明清書肆規模再大，多止於當地經營，幾無可能有南北皆開業情形。

又有寶翰樓刊本，扉頁稱「版存新街口」者，亦非蘇州寶翰樓。蓋當時蘇州無新街口，蘇州寶翰樓出版物亦無如此自述。

<sup>4</sup> 乾隆間者如該肆刊宋葉時撰《宋葉文康公禮會元》四卷。

<sup>5</sup> 本文所使用古籍圖檔，皆檢索自北京「學苑汲古」網站，網址：  
<http://rbcs.calis.edu.cn:8086/aopac/jsp/indexXyjg.jsp>，以下不再出注。



版存新街口寶翰樓書坊書影

## 二、書坊承接私人刻書業務

明清出版雖極為發達，但文人或一般人想要刻書流傳卻非易事。筆者曾對此議題有過討論，而於清初刻書亦然，試以蘇州寶翰樓為例，再加說明之。

寶翰樓刊有《三魚堂四書大全》，其有康熙卅七年初刊、康熙四十一年後刻兩刻。前人或視初刻為嘉會堂刻本。事實上根據初刻陸隴其序與席永珣、王前席諸序知，隴其是書成於康熙廿（1681）年，初無意刊梓，殆其過世後，始由弟子席永珣、王前席二人重校並捐貲，於康熙卅七年付之書林梓行。

按，陸隴其自序：「……自戊戌（1658）至癸卯（1663），用力六年而始畢，然是時雖粗知讀書之門戶，而程朱之《語錄》、文集，皆未之見，敬軒、敬齋諸君子之書，皆未之求，嘉隆以後陽儒陰釋之徒，改頭換面，而似是而非者，猶未盡燭其部。自庚戌（1670）以來，乃始悉求諸家之書觀之，然後知向之去取也。……鑑於前者愆於後也，故曾積而藏之，不敢以示人，親友聞其有是書也，皆欲得而觀焉，或疑其有所吝惜，故敢序其始末以告，使共知其陋，相與戒而勉焉，則勝於讀此書也。」

又識語云：「先生作此序時，距捐館越一紀矣。每憶永恂輩日侍函丈，先生方輯《困勉錄》，必將是書翻閱參考，復用朱筆點次，遂成定本。王申（1692）臘月，將歸當湖，乃語永恂輩曰：『吾一生學力盡在此二書，子其議之。』及易簣前一日，復語其族祖蒿菴翁曰：『余來年欲刻此二書，未知得遂否？』越宿遂卒。茲承生之志，鋟版告成。」

又席序：「既詳加較訂，捐貲授梓。」王序：「重加校訂，授諸書林。」

而承擔梓行書林就是寶翰樓。據今人杜澤遜編《四庫存目標注》<sup>6</sup>一書稱山東大學藏康熙卅七年嘉會堂刊本，其扉葉有「嘉會堂藏版」與「寶翰樓梓行」兩行文字可以知之。嘉會堂為席氏齋名。此為私人與書坊合作刻書形式。其書刻印，委託人取若干，書坊亦可取若干販售，今日各館初刊本存有不多，或可見此為書坊販售之本。據笠井氏〈書目〉指出東京大學所藏嘉會堂本有寶翰樓發兌印，亦可知為販售之本。按，笠井氏〈書目〉一文云日本內閣文庫、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與美國哈佛燕京館藏，又有註記言：

（哈佛藏本）仇序文章行款與內閣藏本、東大藏本不同，御製序、進書表、凡例行款字體亦與內閣藏本、東大藏本不同。（頁 303）

事實上，哈佛藏本為康熙四十一年第二次刊本，所據為同年浙江陸氏刊本而來，日本所藏兩種則為康熙卅七年初刊本。

又如《楚辭箋註》十七卷，扉葉題「汲古閣校」、「吳郡寶翰樓」，每卷末鐫「汲古後人毛表字奏叔依古本是正」木記。此本有鈐寶翰樓印記，亦有無者，或可知為毛表委之寶翰樓刊印，印成後寶翰樓與毛氏分帳，各得之本。

### 三、論清初江南書肆翻/盜印

笠井〈初探〉一文談及《唐詩英華》有寧遠堂與寶翰樓二本問題，他認為兩者同版而寶翰樓本有作過挖改，應該是寶翰樓後得版重印本，其云：

**基本上與寧遠堂刊本同版**，但總目末無此廣告，「卷二十二五代」次行以下有「參閱者」姓名。另外，兩者各卷目錄首均有「參輯者」姓名，寧遠堂刊本所載部分「參輯」姓名在寶翰樓本被制改。其中，魏耕、錢續曾等從事抗清活動，於康熙元年（1662）被處死，董二商、吳炎、潘禮章等受莊廷攏明史案（康熙二年）連累而被處死（或因案發時已去世被開棺戮屍）。**我們可以推測可能是寧遠堂原刊本，明史案（康熙二年）之後，寶翰樓使用其版木，進行上面所述的一些修補，附之於封面而印行的。**

又於〈笠井直美教授講演吳門寶翰樓初探紀要〉一文，陳熙遠教授提出疑問，稱：

笠井教授基於《唐詩英華》序文的署名，認為寧遠堂的經營者可能為顧有孝，至於其所在地則未見相關資料記載。**陳教授進一步回應，認**

<sup>6</sup> 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1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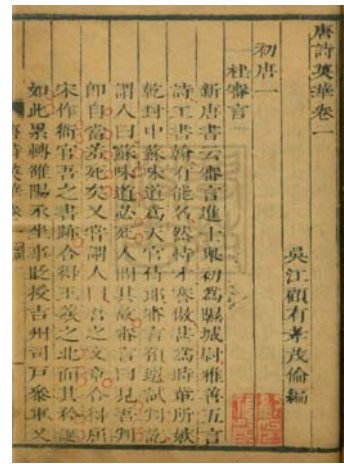
為顧有孝及其友人的經濟狀況並不足以支持書肆的經營，對此實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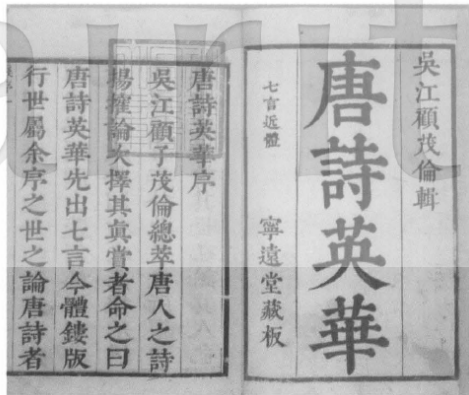
順治 14 年寧遠堂刊本



康熙年間學海樓刊本



康熙寶翰樓刊本



笠井論文所附二書書影

笠井認為文字獄案後，寶翰樓得寧遠堂本修改而成，陳熙遠則認為寧遠堂應無財力支持刊書，應非顧氏所刊。筆者比對寧遠堂與寶翰樓兩種《唐詩英華》刊本書影，兩者不同版可以確知。故笠井所謂同版挖改說不成立。

另假設寧遠堂既然財力無法支應刻資，此本又是怎麼回事？筆者的解讀是寧遠堂委諸某肆加以刊行之本，寶翰樓本則是該肆翻刻修訂所刊印。這個書肆有可能亦是寶翰樓，與《三魚堂四書大全》情形同，然無刻印者堂號。此類「某甲藏版非真某甲藏版」說法未有人談及，筆者曾有文討論<sup>7</sup>。寶翰樓

<sup>7</sup> 見拙撰〈耦園主人陸錦刻李義山詩、文集考辨--兼談某某藏版非真某某藏版之例〉，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》7期，2016年7月，頁60-66

刻《三魚堂四書大全》乃康熙卅七年由席氏委諸刻印，至康熙四十一年再刊本即屬於據浙江陸氏刊本的修訂本，應與席氏無關。

關於翻刻，筆者再舉二例以為說明。陸隴其《三魚堂集》有清康熙間琴川書屋藏版，此本為陸隴其門人席永珣所刊，琴川書屋亦席永珣齋名，永珣亦掃葉山房主人先祖。又有康熙間再修訂<sup>8</sup>的署「嘉會堂藏版」者，兩種核對非同版所印，故可知其中一種應是書坊所印而非席氏印本。再核對琴川書屋刊本與清末老掃葉山房藏版者為同版，因此可以確知署「嘉會堂藏版」者為書坊所印。而這個書坊為何？依其扉頁字體顯示，字劃與寶翰樓本近似，或為寶翰樓所刊印。



琴川書屋版



嘉會堂版



老掃葉山房版

又汲古閣曾刊《孔氏家語》十卷。遼大藏康熙間寶翰樓據以重校勘印。此本扉葉題「汲古閣校」、「吳郡寶翰樓」，又內文版心題「汲古閣毛氏正本」。此書非委刊，而為翻印。

#### 四、本衙為書肆簡稱非官衙

古書扉葉或有「本衙藏版」，所謂「本衙藏版」，前人或以為官府刻書，然現多遭否定。大多數研究者多已持本衙即書肆之稱。筆者曾有文章探討本衙藏版現象，認為有本衙藏版不但是書肆，而且有可能是書肆與私人合作時書坊所自稱。

<sup>8</sup> 此本修訂最明顯為作者署名，琴川書屋本作「門人長熟席永珣/前席校」，修訂本則作「門人吳縣席永珣/太倉王前席校」。事實上應是修訂本為是，原琴川書屋本為非。按，前述杜澤遜編《四庫存目標注》中則受影響，認為王前席為席氏。

衙者非官衙，如是官衙所刊印，其署稱官署本，或簡稱「本衙門」、「本署」、「本院」等名稱，絕無稱「本衙」者。再者，筆者曾見有以套印著稱的凌家亦自稱「凌衙」。故稱衙者應是擁有某種規模的出版單位，各地皆然。然於今日或無以名之，或稱官衙，或不可解。事實上，書肆自稱本衙可以定論。

寶翰樓刻書亦有稱本衙者，如《忠義水滸傳》、《仙佛奇宗》與《蔡虛齋訂正四書索引》扉葉即作「本衙藏版」，扉葉另鈐「寶翰樓章」。這真能反映本衙即寶翰樓否？事實上，吾人從扉葉所用字體與其餘確為寶翰樓刊印者相同，至少可確定。再者，此類刻、印乃為雙重版權保護者。



本衙即書坊自稱書影

### 五、扉葉鈐印乃為版權保護

古書有扉葉，刻以書名、編者（作者）與出版相關事項，用以標記版權，亦可作為版權保護一種形式。蓋翻印（或稱盜印）書依樣作相同扉葉，或另作扉葉，皆非難事，然鈐印則很難模仿。不僅私人刻書如此，書坊刻書亦見有類似此類印記。

陳巧孫〈閒話版權印證〉一文談到《白羽自傳》末有「讀者注意」，略云：「及坊間發見翻版書，或未蓋版權章者，至希惠函通知作者，以便校正查究」者即是。當然這是近代以後的制度。陳巧孫前揭論文認為此制度來自於日本。然筆者認為這種制度也是源自古代中國明清時期，而非近代的日本或西方。

我們翻檢古籍中扉頁鈐有某堂印記者可以得到證明。這類印記一以表示這書是正版，一以維護書坊版權權益。蓋印多少書，版費與作者均分，倘偷

印賣出或他坊盜版，影響雙方獲利，則或提出訴訟。明代出版業發達，這也表示著出版在明代是有利可圖的。既然有利可圖，自然引起一些嗜利之徒，幹起無本盜版生意。因此明清時期，就有類似這樣防盜版的措施。

而要如何證明此印記為版權維護制度下書坊印記？所幸今存日本一部文公祠崇道堂藏版的《監本詩經》可以說明此言之不虛。此書扉頁前有一印：「崇道堂」，以表正版圖記；又刊有「每部有圖章字號，翻刻千里必究」兩行，正以說明之。

又乾隆間重刻《昭明文選》李善注，鈐印有「海錄軒」「長洲葉氏圖書」印。

又山西大學圖書館藏康熙二十（1681）年齊山刻本《蓉川集》，扉頁刻「悠然亭藏版」，又有「悠然亭」硃印；又藏康熙十七（1678）年葛有光刻本《有懷堂集》，有「稷邑葛有光梓」字，又有「有懷堂版」朱印。而這類版權保護直至今日吾人仍可見到。



用以表示正版的鈐印







寶翰樓出版品上鈐印「寶翰樓藏書記」、「寶翰樓章」

而寶翰樓亦同。鈐印有寶翰樓相關印記亦表示它是寶翰樓所出品，向顧客宣示。而筆者亦見有未鈐印者相同之書，如《楚辭箋注》、《增訂廣輿記》等。這應該屬於私人委託刊印，歸於私人者。

#### 六、清初寶翰樓書版的轉移

書版的轉移，一種是租借他坊以獲取租金。這種方式筆者命之為「有償的借版」，原書之書版仍屬原書坊，借用方僅有刷印權。另一種書版的轉移是書版的賣斷，亦即書版所有權完全從甲轉至乙，甲方無權過問乙方。通常發生賣斷式轉移主要是因為原書版擁有者經營出現問題，否則作為生財器具的書版應不致於轉移給他人。

清初寶翰樓亦曾發生書版轉移情形。筆者所見前述《三魚堂四書大全》康熙四十一年二次刻本即是。筆者曾經眼者，除有原書寶翰樓扉葉外，於次葉另有「本坊精選新舊足冊/好版書籍尚有殘篇/短缺認明興賢堂書/舖唐少村無悞」牌記。據此牌記當知此本為書版轉移之證，而非有償借版刷印。此或可知，唐少村書肆除刻書外，亦有收購舊版刷印。

按，興賢書堂起於萬曆年間金陵書肆，肆主為唐少村，其與萬曆間金陵唐少橋書肆應有關係。崇禎間仍續有營業，美國會館藏《葛一龍集》作明崇禎間唐少村興賢書舖刊本。清初仍有營業，應於太平天國時結束營業。刻書有《繡像漢宋奇書》、《鼎鍤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》、《詩法》十卷、《十七史》（得自蘇州書業堂趙氏覆刻汲古閣本）、《天下名山記鈔》十六卷、《日講易經解義》十八卷、《欽定明鑑》二十四卷、《燕詒堂唐詩選》、《（御撰）資治通鑑綱目三編》。現知所刊書，最晚至道光間，如《江蘇詩徵》一百八十三卷與天津圖書館有黃濬纂修《〔道光〕萍鄉縣志》十六卷 10 冊著錄「清道光三年（1823）興賢堂刻本。九行二十五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左右雙

邊。」

### 七、書坊聯合出版始自清初

所謂聯合出版乃指多坊共出一書。此前人或未提及，或以清末官書局所刊為始。事實上，此亦見於清初。聯合出版優點在於聯合多家出版商，減低出版成本，又可以互蒙其利。此類聯合出版或在扉葉共同署名，然亦與書版轉移混淆。今日見北大藏康熙二十二（1683）年《聽嘍堂新選四六全書》二種十六卷，扉葉有「金閭綠蔭堂文雅堂寶翰樓」者應非書版轉移，而屬聯合出版。



《聽嘍堂新選四六全書》書影

綜合本文所述，清初寶翰樓仍承繼明末書肆經營若干情形，諸如與私人合作刻書、面對翻印/盜版，對自身版權維護措施等方面。同時也藉由探究寶翰樓刻書，對版本學上所謂「本衙藏版」又有更多新認知，亦即本衙乃一地較具規模書肆自稱。除此之外，對於寶翰樓經營上，對於出售書版，可以推知其經營出現問題，因此，前人認為寶翰樓至同治間始停業說法，亦可間接推翻。又對於聯合出版始自清初之說，可以進一步確定。

而相關出版文化史的探討必須建構於資料完整性，寶翰樓刻書相關研究，幸賴各館館藏公開與笠井直美教授的努力耙梳，方能有所成。本文僅以寶翰樓一肆所反映清初刻書文化，或僅見一隅，然如能從各地書肆加以探討，相信對探究中國出版文化史當有一份貢獻。